

中國文化世家

ZHONGGUO WENHUA SHIJIA

主编：曹月堂

岭南卷

主编：张新民

 湖北教育出版社



ZHONGGUO WENHUA SHIJIA

岭南卷

中國文化世家

任繼愈題 

主 编：曹月堂

副 主 编：舒 怀 何新文 葛金芳

岭南卷主编：张新民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世家. 岭南卷/张新民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ISBN 7—5351—3820—9

I. 中… II. 张… III. ①文化—名人—中国—古代
②文化—名人—广东省—古代 IV. K82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301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341 千字

(441021·湖北襄樊盛丰路 45 号)
3 插页 15.5 印张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51—3820—9/G·3128

定价:29.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中国文化世家

ZHONGGUO WENHUA SHIJIA

学术顾问：任继愈 来新夏 戴文葆
主 编：曹月堂
副 主 编：舒 怀 何新文 葛金芳
常务编委：邓瑞全 陆才坚 黄 榕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岗	王兆鹏	王树林	权儒学
刘重来	李才栋	吴 光	吴怀祺
何林夏	张 涛	周伟洲	毛远明
贺敬美	高增德	黄季耕	

选题策划：陆才坚 黄 榕

封面题字：任继愈

岭南卷

主 编：张新民

副 主 编：仇 江 何 平 曾燕闻

家族制乃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基础之一,家族之传承关系历来颇为社会所重视,文献亦多有记载。1997年春夏之交,我于北京晤50年代之老学生曹君月堂,时曹君正策划主编《中国文化世家》,邀任顾问。情不可却,遂有所商榷而略贡刍蕘。是年冬,我复于一次会议得见南开大学校友臧恩钰,出其昆仲合著之家族史《边外炊烟》,请我作序。于是乃就世家一体,论述如次:

司马迁著《史记》立世家30卷,起吴太伯世家至三王世家。《索隐》解释世家的含义说:“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其意乃指古代世袭爵位的贵族,或因政治上的优势而世代为官的家族历史。后世则含义日广,遂有“经学世家”、“中医世家”、“文化世家”以至“梨园世家”等,所记多为声名卓著家族之家世事功,而于一般平民家族,殊少及焉。其后虽有谱牒以世其家,而往往史料不足,语焉不详。遂使极为丰富之民情习

总序

ZONGXU

中国文化世家·岭南卷

俗,家族传承均以无所附丽而渐次泯灭,使有关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研究失去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反之,若有家传之类,则凡人口之迁徙、地方之开发、风物人情之记述,皆能有所稽求而为中华文化更增异彩。

臧氏所作乃记其先世至今之艰辛创业,繁衍生息,令人具见一平民家族以一农家如何蔓延于教育、交通、医药、艺术各业之发展趋向。是以一家而辐射各业之家族史,属于世家文化之著述。月堂所论乃就文化一端而言,即所谓专论文化世家之一脉,二者似有所不同。月堂于其编纂纲要中曾对二者有明确界定云:“‘世家文化’与‘文化世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现象。‘世家文化’的重心在文化,对它的研究偏重于文化学上的构建;‘文化世家’的重心在世家,对它的研究偏重于文化传承的家族渊源。”

据此,月堂遂有编纂《中国文化世家》之议,将全国按文化地理区域类型,划分为中州、齐鲁、三晋、燕赵辽海、荆楚、吴越、江右、江淮、岭南、巴蜀、关陇等 11 个地区,各立一卷,共 500 余万字。乃邀集同好,分头运作,期以世纪之交成书。若此体大思精之宏篇巨制,设非月堂之殚精竭虑,诸君子之戮力同心,直若缘木而求鱼。今春月堂函告:《中国文化世家》近期将告杀青,并邀作序。窃惟月堂以积学之士,久羁卑位,郁郁不得申其志。我一介书生,无援手之力,徒唤负负。不意,月堂以花甲之年,奋蹄崛起,广集俊彦,发前贤之所未发,荟中华文化世家于一编。我不仅为学林增一宝藏贺,我更为月堂于晚年得展才智而生熠熠光辉贺,于是赠以“莫笑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句,并乐而为之序。

来新夏

2000 年 4 月 10 日于南开大学遼谷

—

世家作为载史的体例,创于《史记》,但太史公没有对“世家”做严格的定义,似乎既强调了世家地位与影响的重要,也包含了家族、家世的意味。后来,世家是指世代为官的家族,即贵族势要之家,有门阀、世族之称。汉唐之后,随着政治体制的演变,虽然世家大族始终以科举入仕为依归,但世家的含义已偏重于传世久远或家族兴旺了。文化世家,作为一个规范的名称不见于史书。人们习称的有经学世家、梨园世家等,强调的不是政治权势,而是文化的传承,即所谓家学渊源。

本书以文化世家为题,就是讲述自古以来对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或在家学传承上有典型表现的那些家族,甚或仅有一代两代之显的家庭。

前言

QIANYAN

文化世家是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学术课题。我们编写这部书,出自多方面的考虑:

其一,几千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可以称得上文化世家的确是太多了。这是历史的存在。文化的传承、积累与发展,人才的培养与成长,往往离不开家庭、家族的影响。事实上,即使专谈个人或作品,专谈某个时代的文化成就,只要稍作深入的分析或全面的叙述,就不能不涉及一个个家庭或家族,就像谈政治、经济,总会谈到家庭、家族一样。因为“家”毕竟是社会的细胞,个人是家的成员,更何况家族制度的久远和牢固更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仅此而言,对自古以来的文化世家,做一次全方位的搜索、发掘,做一次总结性的清理和表彰,也是很有必要的。

其二,历代“正史”是写帝王将相以及达官贵人的官书。官为本,政为本,而关于文化的载录只是附庸和点缀。与其说是保存了文化,毋宁说是湮没了文化。近代的学术专著,如文学史、哲学史、文化史等,摆脱了官本位、政本位,却因作专题性的阐述或规律性的总结,无形中有着重流轻源,甚或以点代面的局限或缺憾。重点突出了,非重点的,实际上更具社会性的却被大面积忽略。学术史几乎仅为名人大家的聚集。以至于多年来著述的更新,基本上都是点的深入或新探,少见有面的开拓。理论有翻新,基础却不见更宽更厚。本书即以文化世家为题,凡是称得上文化世家的都可收入,而不计其他条件,可举可叙者不啻千数之多。如此必将大大开拓可供研究的文化资源,不会是无益之劳。再者,清朝几百年和辛亥革命后的近半个世纪,是一段很值得总结又缺乏总结的历史。其文化方面尤其如此。本书以1949年为下限,整个清代包括了进去,20世纪的前半叶也包括了,而且

因为时间靠近和材料丰厚,在全书占有较多篇幅。这对中国通史或中国近代史也算是某种补缺吧!

其三,可以说,当前属于社会学的家族史尚缺乏研究,属于教育学的家学研究更似未见。近年来,谱牒学虽已为一些学者所重视,但也尚在起步。对中国文化世家的搜索与研究,必会与这些学科相连接而相互促进。

其四,本书的编写,就是将“世家”纳入文化学的研究范围,突出中国文化遗产与发展方式上家庭、家族性的特征,并由此探讨文化学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家庭、家族作为文化载体的意义,这是历史的存在,而且依然存在于现实乃至今后。家庭、家族除了具有血缘和亲情的属性之外,更有社会属性,是与社会的发展相连的。正如一定的社会制度对文化的发展既有负载、养育和促进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一样,家庭、家族也是如此。我们既要总结家教、家学以及世家风范的具体的积极的影响,更重在宏观上透视和探讨中国的家庭、家族制度与文化发展的多种关系。这样的切入探索,除了对数千年文化遗产的表彰和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之外,更重要的是为现代文化发展和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要之,《中国文化世家》作为一项专题性的表彰和总结,是独立的、完整的,是当做一部纪传体的中国文化世家通史来写的。对今后再作进一步的理论性研究而言,也可说是先作了素材或文献资料的奠基。

三

本书按文化地理的区域类型分卷,包括中州(河南)、齐鲁(山东)、三晋(山西)、燕赵辽海(河北、京津、东北、内蒙)、荆楚(湖北、湖南)、吴越(苏南、浙江、上海)、江右(江西)、江淮(苏北、安徽)、岭

南(两广、云贵、港澳)、巴蜀(四川)、关陇(西北各省),共11卷,总字数约500万字。

全书由各分卷组成。每卷均由总序(前言)、分卷总论、正文三部分组成。世家条目按年代先后顺序编排。每个条目的内容包括:(1)人物生平;(2)文化成就;(3)家学传承的事例;(4)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

本书采取一般的传记体裁。行文以述为主,寓评于述,不作烦琐的考证与辨伪,不作空疏议论,力求平实。

本书的编选对象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两代及两代以上相传,或同代相翼相成,在本地域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有文化成就的世家,包括祖孙、父母子女、叔侄、兄弟、夫妻、舅甥等。选目的确定,以影响大、代表性强的世家为主,但不以“见于经传”为限。各世家从事的学术门类同异不论,但必须有著作或技艺传世(存佚不计)。入选人物的时间上起先秦,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世家代表人物卒年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为限)。分卷按文化地域,每卷入选的世家必须属于该文化区域。对于那些因出生地、活动地或成名地有异而发生籍贯地域之争的世家(如朱熹、杜甫等),一律以该世家代表人物的出生地为准。

本书的资料来源包括正史、野史、方志、谱牒、碑铭、笔记、文集、序跋、书札、学案、专题资料汇编及有文字记载的民间传闻等。

四

100多人,历时4年终于把书写完。时间没白过,人也尽了力,我们心里感到充实。至于水平怎样,价值多高,终究应由读者、专家去说了。当然,我们对自己的成果也有一定的感知和评估。每位作者对自己的文章是如此,本人与各卷主编对全书或各自分卷也是如此。从总体上说,当初的设想,基本上实现了。

因地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各卷的内容自有特点。比如江淮、吴越,明清两代文化世家最多最大,资料极丰富,于是多有大篇;江右文化则以宋代最盛,可写的条目很多而资料多有佚失,所以小篇较多。全书虽有统一的“编纂纲要”和“编写体例”,但文章毕竟是分头去写,水平、风格自难一致。

分卷主编主要负责条目的选录和内容的核实。本人作为总的主编,虽然最后审订了全稿,但也只能做取舍是否得当、体例是否规范的判定和一般性的订误。不仅是水平所限,也受方式、方法和时间的局限,全书的错误或缺漏一定不少。补充、修正,特别是总体的加工和质量的提高,只能留待今后的努力了。那不仅是主观上的再接再厉,客观上也有待于学术界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和建议。现在似乎只能这样,而将来的修订,则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11卷是11个编写单位。创意之初,就定下了当地人写当地世家的原则。我们不是同行间共同撰写一部教材类通史或一般论著。各自的专业虽然都与文献有关,但谈到中国文化世家,都是略知一二;就是所知的一二,也是耳熟而难详。于是,只能分头访察、分工撰写。最好也是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各彰本乡之贤。这除了情感与常识的所长之外,还有资料查访的方便。写众多的地方性世家必当如此,就是写世人皆知的世家,也需充分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料,最少也要翻检方志、谱牒。可以说,这是本书撰写方式上的最大特点。当然由此也带来了文风不一、水平难齐的多种局限。得失相较,我们把求实、求详放在了第一位。

本书创意,是在1996年之春。湖北大学的舒怀、何新文、王兆鹏、鲁毅、郭莹、葛金芳多位教授,都是我的朋友,是他们和我一起策划的。再者,创意之初得到了湖北教育出版社冯芳华、黄

榕、陆才坚诸位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继之，则是邓瑞全、王岗、王树林、何林夏、张涛等年轻朋友和黄季耕、李才栋、高增德、周伟洲、吴光、刘重来、毛远明诸位先生的热心加盟。《文献》杂志的权儒学、贺敬美是我的同事，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教授是我的挚友，他们都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杭州大学束景南教授，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都以重友情、重学术的热心和风格帮助了我。来新夏、戴文葆两位师长是我的当然的学术顾问。任继愈先生，是师长又是领导，他的关心和鼓励自然坚定了我的心志。至于完成本书的主力，即上百位作者，他们既是各分卷主编的朋友，大家自然也成了事业上的朋友和同志。11卷，11支力量完全是靠友情与共同的事业心凝聚在一起的。当然，湖北教育出版社是最可靠的基地和后盾。陆才坚先生是责任编辑也是主持者，从创意策划、制定“编撰纲要”，到审订样稿、统揽全局，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还需告知的，是中国文化信息协会认同并支持了本书的出版。协会领导出自对发展文化事业的责任和热心，在本书和本书作者群体的基础上筹建了家族文化研究会。这为我们的继续前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和宝贵的机遇。大家既然都是主人或参与者，只应互祝互勉而不言谢意了。我只能代表大家向广大读者致意，热望得到广泛的关心、批评和督促，那才是最大的动力和鞭策。

曹月堂

2000年夏于北京后海淘淘居

地处祖国西南和南疆的云南、贵州、广东三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自古以来即以资源丰富、地貌复杂、民族众多、习俗神秘，文化类型各异、社会形态多样，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和考察者，至今仍有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宝地的美称。这里尽管长期被视为蛮夷化外之地，与中原地区相较存在明显差距，然而山川钟灵毓秀，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仍孕育了不少风神俊逸之士，涌现出一批文化世家大族。早在两汉时期，滇黔的张叔、舍人、盛览、许淑、尹珍、孟琚等，即与中原学者广泛交往，他们或受业于司马相如，或拜大儒许慎为师，或注《尔雅》，或受《五经》，或传《说文》，或学韩诗，学成后都回乡开馆办学，教授生徒，开启一方学术教育，促进了文化交融。而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代，则为西汉时期崛起于岭南的经学世家，他们家法授受，世代相承，专治古文经学（主要为《春秋》、《左传》、《易经》），学问渊博精

分

卷

总

论

FENJUAN
ZONGLUN

深,不仅勇于与中原地区今文经学者辩难,而且流风余泽影响南国数代学人,在地方乃至全国都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学术地位,长期被家乡人民尊称为“岭南儒宗”或“儒林之英”。在他们的感召带动下,岭南地区讲学授徒,研习儒家经典,一时蔚成风气。与地处西南的滇黔大传统文化一样,南疆粤东、粤西地区的学术文化也源远流长。中原文化很早就南泽滇、黔、桂、粤四省,从而产生了一批具有文化传播身份的桥梁式代表人物,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区域混合型文化,增加了地方文化累积的丰厚性和多元性。

滇、黔、桂、粤地区文化世家的大量出现,主要集中在唐五代以后,而明清以来最为显著。这自然是农业文化重心不断从北到南迁移,甚至逆转为南方胜过北方的结果。两广特别是云贵尽管与长江中下游或东南地区相较,经济文化力量仍不够发达,但无论经济开发的势头或文化交融积累的进程都远远超过唐宋以前的各代,儒家礼乐教化文化不断由核心城镇向边缘地区辐射和渗透,加上本土山川自然及历史传统的养育与影响(即以积淀的方式融入文化心理),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人才群体都日见其多。广西裴说、裴谔兄弟,在唐哀帝天祐五年(906)同登状元高科,以榜首一二名传为兄弟双首甲佳话,即是杰出人才群体大量涌现的一个重要象征。二人均擅长吟哦,享有诗人盛名,曾同作《湘江吟》,兄裴说诗云:“吟余潮入浦,坐久烧移山。”弟裴谔诗云:“风回山火断,潮落岸冰高。”又同作《经杜甫坟》,兄云:“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弟则云:“名终埋不得,骨任朽何妨。”妙趣中寓深致,殊堪反复玩味。故王士禛《五代诗话》以“景同而语意俱别”许之,并赞叹他们兄弟二人为“双美”。足证原本所谓南方“蛮夷化外”之地,已騷騷乎入于诗国之城了。类似的科举世家,广西尚有融州覃光佃、覃庆元、覃昌祖孙三代。他们在北宋初年一门竟出了三个进士,无论理学思想或诗歌创

作都卓有成就。由于家学授受相传的缘故,其中尤以晚出之孙辈覃昌成就为最高。而明代中叶广东南海伦文叙、伦以谅、伦以训、伦以诰父子四人,竟先后出现“四元两进士”,以至皇帝也赐以“天下第一家”匾额,成为传颂不已的古今佳话。清代贵州贵阳黄辅辰、黄辅相兄弟及辅辰之子彭年、孙国瑾,也一族四人都成进士,并都收入清国史列传。云南历史上虽仅有晚清袁嘉谷一名状元,但其家族世代课读好学,父辈子孙大多有著作传世,也颇能反映当地文化“破天荒”式的突跃情况。最奇特的当推广西富川毛氏世族,不仅南宋开禧年间毛自知高中状元而称第一国手,而且毛氏宗亲仅有宋一代就有二十多名进士。其远祖则可直接溯至为《诗经》作注之毛亨和毛萇。然而这一科举世家尽管耀眼一世,子孙后代历元明清三朝六百余年支流蔓延,却因祖辈冤狱和政治黑暗而灰冷于科举仕进,透露着社会时代炎凉变化的某种悲怆和哀愁。科举是士大夫阶层入仕的必由路径,科举高中与落魄是个人也是家族中的大事,如果说科举的递嬗升降也代表了一方人才蔚起的情况,那么也可说它是文化兴衰起落在科举上的表现。

从时间历程看,滇、黔、桂、粤文化世家绵延孳衍,家族传嬗,流风相师,各代均有兴起;从空间范围看,则更如满天繁星点缀,遍布各个区域,不少地方甚至形成文化名邦,涌现地域学派。其中广西“临桂词派”,即是以临桂籍词人为主体的,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地域文学群体或流派。这一著名词派中的朱依程、朱依真昆仲二人,均擅长诗词,并各有名篇佳作传世。两人相互切磋影响,可谓难得的兄弟诗人,而尤以依真成就最高,被人称为“粤西诗人之冠”。至于作为“临桂词派”旗手的况周颐,则更得力于家学渊源,其远祖可追溯至明代著名清官况钟。祖父祥麟、祖母朱镇、父况洵乃至妻卜氏,都能撰诗填词,并多有著作传世。古文

大家朱琦,则是他的舅外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张大了“临桂词派”的旗帜,使之成为主盟当时词坛的重要清词流派,而且提出了“重”“拙”“大”的词学理论主张,为词学发展作出了承上启下的贡献。难怪其代表性词论著作《蕙风词话》被推评为“千年之绝作”了!而“世代领吟临桂韵,骚坛欲誉况家风”的颂扬,也表达了人们对况氏家族世代家学相承盛况的赞佩,透露了对天造地挺此一门人才以为中国文化添光增色的仰慕。“临桂词派”之所以能崛起于晚清词坛,文化世家以学术积累的方式发挥作用当是一大关键。

另一有代表性的文化名邦或地域学派,乃是贵州遵义沙滩及其学术人才群体。这一人才群体主要以乐安江畔沙滩黎氏家族为主,与邻近望山堂郑氏、青田山莫氏互为婚姻,共为师友,从而形成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学术流派,产生了遐迩闻名的“沙滩文化”。黎氏家族北宋初期以来即注意耕读传家,而尤以明万历年间之黎朝邦训导最严,曾明白告诫族人子孙:“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不可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故黎氏家风秩然威肃而绝不傲慢疏懒,影响当地人皆知黽勉敬业,从而形成一方文化良好习俗。沿至清初五世孙黎安理,其要求自立好义之风益有特色,故子孙辈都有清正奋励的人才出现,而尤以孙黎庶昌和外孙郑珍最为突出。后者为崛起于西南之一代巨儒,前者则为清季著名外交家和散文家。郑珍撰有《母教录》,回忆母亲教诲之懿言嘉行,庶昌之父著有《教余教子录》,从中可见家学授受潜移默化对庶昌等人的熏陶。最值得一提的则是《母教录》一书,从中不难窥见母亲身教言传对文化价值传承的重要。郑母黎三姑是黎安理之三女,早年饱历艰苦生活磨炼,一生教育子女极有方法和成效,

譬如她曾教育郑珍说：“先舅（郑学山）未作秀才时，常白日牧牛割马草，夜始读书，布袜惟入冬始得著。独子之家，衣食饶足，教子之严如此。”又说：“读书人于本分事件件能得，急时皆有受用处。先大人穷时课生徒，每有间，即登纺车，膝上置书一册，手目并用，线虽粗，日所赢可一人食。谚曰：‘男无志，纺棉花；女无志，走娘家。’顽惰子弟每以此借口，于衣食事全不解。倘一朝落泊，去做那一件？”她不仅教育子女刻苦读书，而且要求他们依靠劳动自立。自立是人生根本大事，有助于自立的谋衣谋食的劳动能够维护个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然也就是读书人的“本分事”。这是颇有识见的“自立自主”的价值观念，不妨视之为明清两代“勤俭治生”新思想动向在边地的反映，完全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性的文化伦理资源。家族中更微小的家庭是生命情感发展的自然场所，纯正的母爱是天地间最可贵的情义，是生命成长的精神性动力，是人生最高境界的展现。充满纯真亲情的家学教育，则是人才身心健康成长的基本条件之一。郑珍在母亲谆谆教导下成为一代经学大师，洵非偶然。沙滩文化之沾溉黔省，郑母的功绩是应该大书一笔的。而郑珍曾感慨说，“太孺人再造我郑氏之力也”，也足证母亲这一身份角色对文化世家伦理关系的维系及价值传承的作用是何等重要！沙滩之所以能成为西南地区的文化名邦，原因之一即是在文化世家氛围的培育涵化下，出现了一大批敦行积学之士。类似的例证还有广西郁林何世锦、何以尚父子。世锦早年丧父，由母亲孤苦养育，一生以孝行闻名，故子以尚汇集其身教言传为《孝行经》一书，字里行间则表现了亲子之情所呈现的人生最高贵境界。

文化世家以学术积累的方式代代相互传承而形成“家学”特征，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为人才的涵濡培育提供了其所必需的丰富而有生机的文化资源。这一点以著名岭南香山黄氏文化世家